

laozabanerlaozabanerlaozabaner

老东野儿

陈铁军 著





目 录

头	(1)
故事一	神裁 (11)
故事二	走人 (18)
故事三	巨贼 (26)
故事四	哑巴 (34)
故事五	义仆 (41)
故事六	纸钱 (50)
故事七	怄气 (60)
故事八	洋丐 (68)
故事九	异食 (76)
故事十	戏法 (84)
故事十一	找事儿 (92)
故事十二	贼店 (101)
故事十三	贼坯 (108)
故事十四	孬孙 (116)
故事十五	抓阄 (123)

故事十	六	保镖	(131)
故事十	七	轿夫	(140)
故事十	八	孙子	(149)
故事十	九	野仙儿	(157)
故事二	十	捉贼	(164)
故事二十一		草民	(173)
故事二十二		吃家儿	(180)
故事二十三		贩卖	(188)
故事二十四		骂名	(197)
故事二十五		残坏	(206)
故事二十六		憋子	(214)
故事二十七		逐臭	(223)
故事二十八		占位儿	(232)
故事二十九		瘸人	(240)
故事三	十	哭祭	(247)
故事三十一		废品	(255)

故事三十二 变脸.....	(264)
故事三十三 混子.....	(273)
尾.....	(283)

头

那时候我们郑州西门外有个地方叫老坟岗，最早曾是個丘冢麇集魂吟鬼唱之处，后来随着陇海和平汉铁路的相继通车，郑州工商各业日渐繁荣兴旺，由昔日风沙小城壮阳为了新兴商业城市，这片死人的地盘也逐渐被活人接管了政权，成了三江两湖人物堆垛之处。一时间说书卖唱、算命看相、打拳卖艺、杂耍马戏、乞丐游医、骗子妓女无所不有，在当时南北二道东西两行名噪一时，时至今日还被那些上了年纪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人们津津乐道。

在这一时期的老坟岗人物中，名头最为响亮的人物姓陈叫做陈大炮，是个做汉生意的“妥汉”。“汉”是江湖隐语，泛指游医卖药的人，而“妥汉”则专指这种人中卖狗皮膏药的那部分人。不论什么“汉”卖药之前都得先圆粘儿，也就是先想法儿将人们招揽来。圆粘儿的法儿因人而异，或舞枪弄棒、或耍猴玩蛇、或魔术杂技、或说书唱戏，总之是会什么练什么，说雅了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说粗的叫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而陈大炮所使用的手段就是说书，而他

所以名噪当时也是因为说书。

说书的按着讲说内容分四种，用那时候的说法叫做“说话四家”：说小说的——讲说烟粉、灵怪、公案、传奇故事；说史书的——讲说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说经书的——以演说因果关系、善恶报应等说教为内容；说浑话的——以传播鄙陋俚俗、色情淫秽等思想为能事。每一种按着现在的说法都拥有固定的读者群。但是陈大炮却不属于其中的任何流派。这是人们见过的说书的人中惟一一个没有任何师承和来历的人，如果贬他的话可以叫做无种可言，而如果褒他的话又可以叫做自成一家。这个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人，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对传统意义上的说书二字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解构。这个解构主义者在形式上一反传统的长篇大论，从卖狗皮膏药的实际出发，结合这一行当来去不定行色匆匆的特点，专门讲叙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一气呵成、自成一回的小段子，既达到了把闲杂人等吸引到身边的目的，又不至于买椟还珠耽误了自己卖膏药；在内容上则一反传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动不动就拿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教训人那一套，而是关注现实关注社会，信手拈取发生在人们身边的真人真事，即兴编排成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段子，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现实社会种种黑暗丑陋现象，传统礼教、鄙俗陋习、军阀显贵、贪官污吏、势利小人、市井无赖无不是他骂骂咧咧的对象。正是他的这种独树一帜和别开生面，使得他在老坟岗那么多江湖人物里卓尔不群，一点儿也不像个靠卖狗皮膏药维持生计的人，而更像是个冯梦龙、蒲松龄那样的民间文学家。

凡是听过陈大炮以说书形式詈骂世道的人们，无不交

口称赞这是一条吃砖头屙瓦片的硬汉子。这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却不把任何高高在上的人放在眼里，不管是谁都敢骂你个狗血喷头，只要他从心里瞅着你这人不顺眼。该陈生活的时代不幸正当乱世，简直乱到了连话都不让人说的程度，差不多是个公共场所都挂着“莫谈国事”的牌子，普通老百姓无不生活得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几乎连屁都是夹着放的，惟恐稍不留神祸从口出自己把自己交代了，但是这个骂不绝口的人却丝毫不把这一点放在心上，不仅肆无忌惮地想怎么骂就怎么骂，而且越是寻常人们敢怒而不敢骂的东西，他越是骂得指名道姓高声大噪淋漓尽致，他的大炮这个名字就是由此而得的。譬如那时候我们郑州就像俗话常说的经常城头变换大王旗，每一次改朝换代都给老百姓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而每当这时陈大炮都会迎来一次以骂娘为主题的创作新高潮。吴姓军阀主豫他骂姓吴的根底浅——一次姓吴的打了胜仗后大宴有功将官，席间命一最得宠的爱妾吹箫助兴，一曲吹罢赢来满座掌声喝彩声，这个爱妾见此情形谦逊了一句：“奴家的箫不如我翁公吹得好。”不料竟惹得姓吴的勃然大怒，当场命令手下将这个不知做了什么错事的女子拉出去毙了。却原来翁公者乃吴姓军阀之父，从前曾在杠房里做过吹鼓手，该吴认为被人这么说是扬了他的家丑揭了他的疮疤。冯姓军阀主豫他骂姓冯的大老粗——姓冯的在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后，有一个老家的叔伯亲戚来找他要官做，这个亲戚在老家是赶马车的，姓冯的却只管让其做了连长。上任头一天这个亲戚带领连队出操，喊完“齐步走”之后忘了其他口令怎么喊，眼看连队就要走进水沟里，情急之下使出了赶马车本领，右手

一扬大喊了一声“嗨”，意思是喝令连队向右转，喊过之后一看大兵们还在一个劲儿向前走，急得又撂出来一句喝令牲口止步的口号“吁——”，从此得了个外号叫“嗨吁连长”。甚至对杀人不眨眼的日本人他也敢出言不逊，跳脚狂骂他们婊子立牌坊——日本人占领我们郑州以后，为了向被占领者表示亲善，让全体市民民主选举维持会长，选票发出后却又派人挨家挨户收购，每张选票的价格或饼干一袋、或面条一碗、或包子四个。气急败坏的陈大炮当着日伪的面儿破口大骂这个维持会长是“饼干会长”、“面条会长”和“包子会长”。总之是走哪儿骂哪儿，逮住谁骂谁，一天到晚嘴不事闲，哪壶不开偏提哪壶。

那时候老坟岗靠嘴吃饭的人不可胜数，但是绝大多数也就是混个吃不饱也饿不死的程度，惟有这个叫做陈大炮的人，吃得肚子里像揣着两挂大肠，光看一眼就能把人气个半死。曾经有一个时期，只要这个陈大炮背着狗皮膏药口袋在这里一露面儿，立刻就会被整条街的人呼啦一声围在当间。人们从未见过一个有卖假药之嫌的人如此受人欢迎。大家伙儿争先恐后抢购着他的狗皮膏药，不是为了朝哪儿贴，而是为了听他讽世骂世。正因为那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世道，差不多每个人心口都窝着一股无名火，看见马路边的石头都想踢一脚，而这个恶言恶语之人所讽所骂的人和事，恰是他们耿耿于怀和切齿痛恨的，他们早已不知在心底暗骂过多少遍了，因此这些骂人话就跟从他们自己口中说出来的差不多，因此他们都感到就像自己刚骂过人似的心情舒展通体畅然，那一肚皮的鸟火终于得到了释放和宣泄。也就是说陈大炮在这里所扮演的实际上是他们的代言

人角色。这世上再也没有比想骂谁骂谁、想怎么骂就怎么骂更加痛快淋漓的事情了，因此这个代人骂娘的人不论走到哪里都被众星捧月，吃香得就像某家著名饭馆的首席厨师炒的菜。

当然鼎鼎骂名为陈大炮赢得了巨大声誉的同时，也为他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骂人这种事情如果说白了的话，和杀人性质相同，只不过情节较轻而已。既然杀人的人会为自己招致相应的惩罚，那么骂人的人同样会给自己惹来各种各样的麻烦，因为这世上并非所有一切都是想骂就可以骂的。令陈大炮为此而付出巨大代价的当然是那些骂不得的人。自从陈大炮在老坟岗中以骂人而著称后，他骂的种种难听话很快传到了这些挨骂的人耳朵里，不用说这些眼里容不得半点儿沙子的人一听全都气炸了。说书的行当里有句隐语，管删去书中部分内容叫“马了去”。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气势汹汹找到陈大炮，吹胡子瞪眼地要求将骂及他们的内容统统马了去。本来这在他们看来只是一句话的事儿，这世上还没有谁敢让他们说出来的话掉地上。可是没想到结果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区区一个卖狗皮膏药的，在他们眼里就像俗话常说的蛋皮上的灰，是任何时候想搓都能搓了的，而陈大炮竟敢两眼球儿一翻根本不尿他们这一壶。陈大炮的这种不识时务一下子将他自己给耽误了。先是老坟岗的保长以伤风败俗为由不容分说非要将他从这一片儿撵出去，之后被他骂得抬不起头来的黑社会又老鹰捉小鸡般将他捉去打了个体无完肤，接着吴姓和冯姓军阀的警察局又不问青红皂白先后拘押他共达数月之久，后来日军宪兵队又上过他不知多少回老虎凳灌过他不知多少回辣

椒水。总之一句话是受尽了非人的折磨，让人感到这个叫陈大炮的幸亏是个人，若是换成其他东西恐怕早被摆治零散了。但是没想到陈大炮的脾气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直来直去，这一记记来自生活的重拳不仅没有将他揍趴那儿，反而越发激起了他非还手不可的逆反心理，每次虎口余生之后都比从前骂得更加坚定更加欢实，嗓门儿大得连老坟岗之外的人们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幸亏当时社会尽管十分黑暗，但还没有黑暗到什么也看不见的地步，对于不同的声音有时候还能够勉强容忍，连比陈大炮骂得还难听的鲁迅最后都能混个无疾而终就是最好的例证。加之陈大炮本人已经产生很大社会影响，其名声早已不囿于可有可无的下层社会，当时郑州各大报纸都报道过他的事迹刊登过他的照片，被公认为是其时我们郑州“八大怪”之一。所以尽管那些挨骂的人都恨不能让他永远地闭上嘴，但是由于怕留下更大的骂名，还是不敢随随便便地将他从这世上彻底马了去。

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突然听不到了陈大炮骂骂咧咧的声音。那是我们郑州解放以后，新生政权坚决革除了旧社会的一切黑暗丑恶现象，从前群魔乱舞的鬼域世界变成了歌舞升平的朗朗乾坤，使得这个以现实生活为创作源泉的骂家儿一下子失去了可骂的素材。加之人民政府很快为老坟岗的三教九流人们安排了工作，陈大炮本人也因为有张好嘴被安置到了曲艺团，成了拿靠牌儿工资的人民演员，而再也不用靠卖狗皮膏药为生了。所以在这一时期里那个动不动骂娘的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心满意足开朗乐观的人，人们都以为昨日的陈大炮就算随着旧社会一起消

失了。但是没想到这种情形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就在这时月份牌儿掀到了公元一九五七年，在这一年里我们的党鼓励全体人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帮助整风，具体到曲艺团，组织上便将这一差事作为严肃的政治任务交给了他。这时候陈大炮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骂过什么了，新生活已经将他改变成了一个不管见了谁不笑都不说话的人，这种人你是很难从他那里听到逆耳的声音的。所以陈大炮本人非常不情愿揽这个差事。他的这种不情愿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这个曾经骂名昭著的人从内心里觉得，这么好的社会谁要是再骂它谁就是坏了良心。然而就像俗话常说的不看僧面看佛面，尽管陈大炮心里一千一万个不情愿，但是却经不住人们三番五次地动员，而且每次动员都不是以个人而是以组织的名义，话说到这份儿上被动员的人就是再不想骂也不得不骂了，如果他再不骂给人的感觉就是在摆架子了。说什么都不愿再骂了的陈大炮完全是由于盛情难却，不得不勉为其难地站出来骂了那么一小段。没想到这一骂骂坏了。陈大炮所骂的这个人是他们曲艺团的支部书记。那时候人家烧的都是自制煤饼，有一次这个书记朝家里搬煤饼，陈大炮明明看见了却假装没看见，从那以后这人老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给他小鞋穿。陈大炮也是实在没什么可骂了，不知怎么把这件事情想起来了，随口骂了这个书记一句心胸狭隘公报私仇。就是这么一句话把陈大炮骂到茄棵儿里了，几天以后他的这句话成了反党言论，并为他招致了一顶当时叫做右派分子的沉重帽子，就像那时候的所有右派分子一样，开始了漫漫无际饥寒交迫的灰暗日子。

陈大炮的右派生涯是在省劳改大队某支队度过的，据

说这一时期他对生活给予的这一嘴巴怀有严重的抵触心理，他信口开河日天日地地骂了一辈子，反动军阀和日本鬼子那么穷凶极恶都没能将他怎么样，而如今只不过骂了一个书记还是支部级别的，就遭到了生活的如此摧残和虐待，真它娘的脚的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他到那里没几天，便又重新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骂骂咧咧的人，不管看到什么不顺眼的东西都要龇牙咧嘴骂上一段。而他当时的遭遇和心情决定了他不可能有看着顺眼的事情，哪怕是个鸡蛋在他眼里也尽是横七竖八的骨头和刺儿，所以人们看到这个人一天到晚横眉立眼骂不绝口，就好像谁都欠着他几百吊钱似的。他这么做的结果，当然就像那时候人们形容的那样，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由于他在服刑期间“顽固坚持反动立场”，除了被不断地关禁闭蹲小号之外，前后几次都是即将刑满之时又被政府延长了刑期。直到俗话常说的粉碎了“四人帮”，才得以平反重新回到了我们郑州。但是这一切不仅没能让这世上多出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反而使得这个人的嗓门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这时候已经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这个撇开了的人放开喉咙畅所欲骂了。陈大炮是因患癌症医治无效而死的，人们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是陈大炮的具体情况却正相反，也许是意识到死到临头气急败坏，在弥留人世的最后一段时日里他的狂骂达到了一个新高潮，见人骂人对物骂物，骂得医生护士亲戚朋友都不敢往他病房里去。最后终于把为他送终的儿子骂得不耐烦了，忍无可忍地反骂道：“你个老不死的还有完没完了？！”但是这个行将就木的人比对方还要不耐烦，索性跟这个世界论堆儿道：“老子我今天就是骂了，你它妈能

把我怎么样吧！”这是陈大炮留给这世上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一说完他便两腿一蹬咽了气儿。

我是在陈大炮死后才听说了他的故事的。对我讲述这个故事的人是我的父亲，而故事中的陈大炮不是外人，他是我父亲的父亲，论起来我还得管他叫祖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在这世上还有个祖父，但是直到我长大成人以前这个人一直在不知什么地方劳动改造着，而我的父亲试图使我接受的说法是这个人一直在老家居住着，所以我对他的全部印象始终局限在祖父这俩字儿的字面意义上，对有这么一门儿亲戚的感觉并不是很明显很强烈。我第一次见到我的祖父当然是在他从老家回来的时候，那时我已经是个以东拼西凑和一稿多投而著称的自由撰稿人，正是由于许多年来这个人在我心里的可有可无位置，所以当一个佝偻背的农村老人背着铺盖卷儿出现在我们家时，我甚至怀疑这个窝窝囊囊的人走错路认错门了，我的嘴张了几张但是直到最后也没叫出我该叫他的那个称呼。说瞎话我是你儿子，多年以来我的祖父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个前鸡胸后罗锅的农村老人形象，直到他像俗语常说的交了面本儿以后，我和我的父亲站在火葬场的骨灰盒架子前，我的父亲对我讲述了关于他的这个故事，这个老人一直佝偻着的腰在我眼前才第一次挺直了起来。那段时间我一直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大家都在不约而同地指责我写的东西越来越没意思，就像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腌臜党八股时说的“文章硬似铁，读得满嘴血”，有个当年听过我祖父说书后来又看过我写的文章的人甚至认为“你比你爷爷差远了”，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试图改变这一局面。大约正是由于这

一原因，当我祖父和他当年嬉笑怒骂的口头文学，通过我父亲的叙述传达我这里的一瞬间，我几乎立刻被它们的直来直去、活泼生动和多姿多彩感染了，萌生了将此民间说唱收集整理成书面文章转述给更多人们的想法。我知道我这是在干什么，我是在努力学习着像我祖父一样生活。遗憾的是我的这种想法产生得太晚了，这些讽世骂世文的原创者我祖父已经离开了人世，这给我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增加了很大难度。由于我祖父出口成章的那些故事大多散见于劳苦大众之间，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我所致力的主要是对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人们的追问，但是因为其中许多段子的流传年代过于久远了，而被追问者的文化教养又大都停留在一般水平，故而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完整地转达我祖父当年的讲说内容和叙事原貌，最多也就是记个大致故事情节和个别精彩语言，而我对这一切的收集和整理，也只能是在这些大差不差的故事情节和语言风格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并对其中一些现在人已经难以理解了的东西用现在的说法进行了夹叙夹议。这对我祖父也许是一种糟蹋，但对我本人却无疑是一次磨练。

套一句我祖父当年常说的词儿——闲话少说书归正传，让我这就开始做我祖父故事的转述者吧。假若我不幸讲砸了，希望我九泉之下的祖父不要见笑。

故事一 神裁

当事人分别叫张千和李万。

张千是个老实巴交的小买卖人，一生温良恭俭让，走路时被人踩一脚，反要作揖赔笑说：“对不起我硌了你的脚。”李万则是个谁也不服的街头无赖，两个肩膀拗个头，走路时踩了人一脚，反要横眉立眼道：“操你妈你敢硌我脚。”

事儿的起因很简单。张千借给李万一笔钱。借钱时李万也立了借据，写明了钱数、利息和归还时间。本来这只是寻常不过的民间经济活动，没什么值得一书的。但事儿奇就奇在，到了约定期限，准备去讨债的张千一看那借据一下子傻脸了，原来白纸黑字的借据，不知怎么一个字都没有了，仅剩了毫无表情的一张纸。却原来李万在借钱的时候装了个孬，不知从哪儿学了个邪法儿，写字儿用的不是寻常墨汁儿，而是乌贼墨汁儿，这种墨汁儿写的时候也是要多黑有多黑，但过不了多久，字迹便会自动褪色消失，就跟什么字儿都没写过似的。江湖中许多狡猾之徒都用这种秘术骗人钱财。张千是个规行矩步的本分人，哪里知道世道和人

心如此险恶，不由得目瞪口呆。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张千道：“你还我钱。”李万反道：“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张千道：“我明明把钱借给你了，做人可得凭良心。”李万道：“你说借给我就借给我了，你有什么证据？”张千道：“我可以赌咒，我要说瞎话我不是人。”李万道：“赌咒谁不会呀，我也可以赌咒，我要说瞎话我不是人。”双方陷入了僵局。

那时候我们郑州人法制意识还比较淡薄，有事儿首先想到的不是寻求正经的法律援助，而更多地求助于民间习惯法。家里有事儿找家长，族里有事儿找族长，行会有事儿找会长，帮会有事儿找帮主。这都是些年高德劭、是非分明而又能说会道的人，职能就是负责裁决各自范围内的民事纠纷，等于是不拿国家工资的民间法官，一般财产争执、婚姻纠纷、盗窃案件、违犯伦理纲常和宗教禁忌的事儿都归他们管。张千一看和李万没法儿私下了结了，便将事儿诉到了他们那一片儿的保长那儿，请求一保之长主持公道，予以公正合理的评判和解决。

张千李万居住在我们郑州的西门口，他们那一片儿的保长姓郭。郭保长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之后，也觉得这件事情很挠头。因为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就是俗话常说的“都说得跟真的似的”，很难分清谁是真的谁不是真的。当然郭保长尽管没挂正式法官那块“明镜高悬”的匾，心里头却跟明镜似的，很清楚这里边谁是谁非。他和张千李万都是一辈子的街坊，对双方人品了若指掌，扒了皮也能认出他们的骨头。但是事情操蛋就操蛋在空口无凭。理直的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其直，所以理曲的便显得一点儿也不曲。这就使得他左右为难，不能凭心而论，哪怕再直